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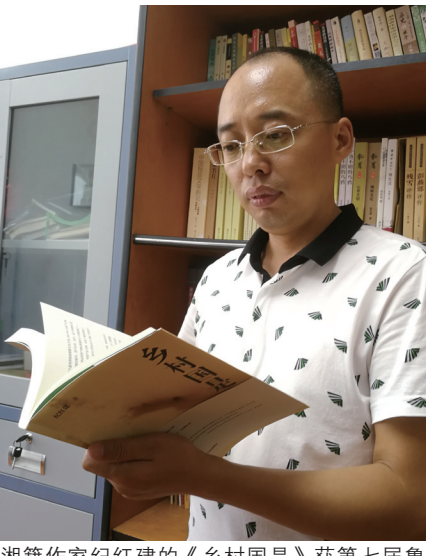
8月11日，备受瞩目的第七届（2014—2017）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正式公布，其中湖南作家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获得报告文学奖。他也是本届唯一获奖的湘籍作家。

纪红建是长沙望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目前，他已出版《中国御林军》《明朝抗倭二百年》等长篇报告文学十余部。曾获解放军文艺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奖励。

今日女报/凤网在获知纪红建获鲁迅文学奖的消息后，于8月11日在今日女报/凤网全媒体上刊发了《乡村国是》一书的策划、编辑周熠以及《湖南报告文学》副主编王杏芬撰写的特约文章，听她们讲述纪红建和他的《乡村国是》。随后，我们也采访到了纪红建，听他聊聊写作路上的收获与汗水。

扫一扫，分享纪红建的故事

采访路上，最触动他的是“当代女愚公”



湘籍作家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章清清

“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做一个忠实的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这一点，在我心中从未动摇过。”8月13日，纪红建对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表示，《乡村国是》能获奖，他认为首先是关注了“精准扶贫”这一国家战略的重大题材。另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他深入到一线，在这部作品里把所有的笔墨放在了最普通的脱贫群众、最基础的扶贫干部身上，传递了老百姓最朴素的一种情感，在立意上和写作手法、文学性方面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纪红建说，这个作品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不同的地方是，他走的地方更加宽阔，笔下的故事也更加感人。

两年多的时间，他深入到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脚步遍及全国东西南北中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个县、走访了202个村庄。

在路上，纪红建采访了全国扶贫先进个人、“当代女愚公”邓迎香，扶贫攻坚好支书“吴天来”等一大批先进扶贫典型，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村民们那种为了生存、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坚忍不拔与自然抗争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

其中，邓迎春的事迹让纪红建感到特别震撼。这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贵州农村妇女，她带着村民们13年“砍山凿洞”，硬是在大山肚子里“刨”出了一条长200多米的隧道。让村里的出山路从2个半小时变成了15分钟。

还有一位来自四川巴中市恩阳区的女扶贫志愿者的故事让他深深感动。

纪红建说，这位女志愿者叫张彦杰，本身是一位乳腺癌患者。她和丈夫创建“巴中市兔兔爱心助学团队”，10年来走遍巴中三县两区，行程6万多公里，走访贫困生15000多名，募捐400多万元，长期“一对一”资助651名贫困学生完成了学业。而这样的故事，纪红建说还有很多很多。

“有好多次，我坐在车上，忍不住流泪。我看到了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看到了基层扶贫干部奉献精神的传承。”纪红建说，他切身感受到了贫困地区环境和人文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中国脱贫之路的无比艰辛。

女编辑披露《乡村国是》出版幕后故事

文/周熠

2013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十八洞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自此，中国扶贫事业拉开了新的序幕。也是这时，我开始关注扶贫、脱贫攻坚战。

2014年年底的一天，我给纪红建老师打电话：“纪老师，您想写一部公益题材的好作品，有一个非常好的选题，我相信您能做好它。”当天，我们都很激动，聊起了彼此对扶贫工作的了解，聊起了这个选题的重大价值。

到2015年年中，我们初步拟定了一个方向：将大叙事与小故事相结合、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相结合、国家情怀与个人情感相结合、现实笔法与理性思辨相结合，创作一部全景式描写共和国脱贫攻坚历史与现状的有血有肉的原创文学精品。

要写一部反映全国扶贫、脱贫工作的报告文学，该走多少地方，采访多少人啊！关键是，如果没有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和支持，不仅得不到权威数据，要联系上扶贫干部们都是不易的事。

纪老师没向出版社寻求帮助，而是自己一声不吭就行动起来了。

他的担当精神很快感动了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的黄承伟主任。得到黄主任的支持和指导后，纪红建老师踏上了漫长的采访之路。

接下来，纪老师走过的地方，涉及中国重点脱贫地区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众多村庄。他孤身一人，带着简单行李、一个笔记本电脑和一支录音笔，走进大山，行走上万公里。

通过走访贫困户、脱贫的老乡、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工作者，纪红建老师带回了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另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与扶贫脱贫相关的理论专著。

纪红建采访贵州罗甸县沫阳镇董架社区麻怀村村委会主任邓迎香。

可是，问题来了，这么多的素材，该如何组织？怎样才能最全面地反映我国脱贫攻坚的现实？怎样才能写好一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书？为此，纪老师从不同的角度构建了三四个方案。通过向作家前辈、朋友和文学评论家请教，最后确定，序章一定要宏大，要能展现我国脱贫事业的历史性贡献。随后，历时6个月，2017年6月中旬，纪老师完成了40多万字的初稿。

在这过程中，黄承伟主任一直密切关注纪老师的动态，每当有关于扶贫脱贫的重要资料，都会转发给纪老师，也不时关心纪老师的写作进度。

6月30日，黄承伟组织扶贫领域、文学领域的专家在国务院扶贫办会议室里开会，研讨作品的价值，对作品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

专家们高度肯定了作品的价值，也无不称赞作品的内容。

综合专家们的意见，用了两个月时间，我“盯着”纪红建老师完成了修改任务。通过修改，书稿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书稿删减了几万字，最后定稿不到40万字。

2017年9月，《乡村国是》正式出版。这是我社献礼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出版重点图书。

（作者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编审；《乡村国是》策划、编辑）

纪红建和他的《乡村国是》：老实人，大力量

文/王杏芬

在湖南省作家协会机关及下属的毛泽东文学院内，纪红建的忠厚实诚是有口皆碑的。因为他来自望城，又得另一美誉：雷锋家乡活雷锋。这不是调侃，而是同事们的共识。

望城因雷锋而名扬天下，而雷锋精神的一个亮点便是“傻”。这种“傻”，与大众脑海里的“老实”几乎是同义词。

没人说纪红建傻，但确实有人评价他老实。

而我的理解，“老实”并非迂腐，更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情商与智商俱高的表现。冲着“老实”这两字，很容易让人亲近。

之所以能拥有让人迅速亲近的性格因子，应该来源于红建农家子弟的出身。他不止一次跟我表示过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直至现在，他的父母还在望城新康乡下务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父亲在石渚湖一带喂鸭，这曾是全家生计的重要来源。

《乡村国是》的采访，自费走14个省、202个村庄的工薪族作家纪红建，可想而知经济并不宽裕，而他的行走本身就蕴含文艺扶贫的实质。

写《乡村国是》前，他有过犹豫。要真实反映中国反贫困、消灭贫困的伟大斗争现实，要讲述基层扶贫工作者的故事，采访范围之广，采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红建是个有担当的报告文学作家，部队服役的经历也馈赠了他良好的体魄。念头一旦形成，他便开始了行动。

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罗霄山区、昆仑山区、闽东山区……两年多的时间，他只身一人采访、行走。

记得那段时期，因为工作缘故，我与他电话联系频繁。那端的他不是在火车上，就是挤在农用车上。

有次他在青海乘坐公交车到长途汽车站，要转乘班车去下面的贫困村。聊着聊着他的采访，就听他懊恼一声：“糟了，杏芬姐，我坐过头了。”

还有一次，他从贵州的晴隆县赶往贵阳，因为那里有个采访等着他。天已晚，客车已停运，为了赶时间，他上了一辆黑车。7座的规制，连同他在内塞了满满17人。

车到贵阳已是晚上10点多，而车子并不下高速，红建就在高速路旁下了车。正当他准备翻过高速路围栏，走下高速路时，他突然发现手里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电脑包。里面装了存满资料的笔记本电脑、U盘以及录音笔。

没有司机电话的红建几乎瘫坐在了黑黢黢的高速路边，那是他艰难行走得来的全部心血啊！平素坚强的男子汉，在异乡的星空下，无助得泪湿脸颊。

不知过了多久，他的手机响了，是黔西南州的号码。话筒那头传来的女声正是车上的售票员。她在电脑包里发现了红建的几张名片，便照着上面的电话打了过来。

半小时后，电脑包毫发无损送到了红建手里。感激万分的红建掏出两百元钱给那女子，女子执意不要。问她名字，她只淡淡一笑，说：“我是晴隆的。”话刚讲完，就上车离去。

抱着失而复得的笔记本电脑，红建要把《乡村国是》写好的决心愈加坚定。不为别的，只为广大乡村土地上那群质朴的人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湖南报告文学》副主编）